

古典政治文明是政治知识化的典范。它把政治制度的建构与政治道理的说明有机地统一了起来;把用知识解释政治和政治本体的知识化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中国古代政治运作中,政治与知识的关系也很紧密,不过不是政治知识化,而是知识政治化,政治神秘化。中国传统政治树立了知识权力化的思想——“学而优则仕”;建构了知识权力化的制度——科举制。在那里,知识相对于政治而言,只具有工具意义和解释的功能。其创新政治、批判政治和规范政治的功能大受限制。所以,中国传统政治始终走不出朝代更替的怪圈。中国近现代政治的成长是伴随着新知识的引入而生的。中国近代政治主要以西学为知识基础,但对生长于本土的中学知识却采取了不理性的态度。中国现代政治以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本土知识的结合为支撑,但对西方现代知识的包容性不够。因而,中国近现代政治建设的知识基础都存在一定的意义的缺损。这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对政治与知识的关系的认识不够清晰,出现误区,以及政治本体的知识化程度相对肤浅,政治生活时而理想化,时而神秘化、经验化和泛化的一大引因。改革开放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即明确提出:“……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此后,举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知识补课浪潮,政治知识化也获得了难得的机遇。

党的十六大提出执政能力建设、科学执政等一系列涉及政治发展的重大命题,翻开了中国政治知识化和政治建设的新篇章。执政能力建设、

科学执政是与政治知识化密切相关的命题。能力以知识为基础,是知识的深化和运用的具体体现。科学以探索规律为己任,是知识的演绎。实现科学执政的关键在于对政治生活规律有清晰的认识,这就要求执政者和参政者掌握科学的政治知识,通过理性执政与理性参政的良性互动来实现。

参考文献:

[1] 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97.
[2] 刘易斯 阿. 经济增长理论[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204.
[3] 奇尔科特 罗. 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92.
[4] 麦克里兰 约. 西方政治思想史[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3: 38.
[5]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148.
[6] 费孝通. 皇权与绅权[M] / 费孝通文集: 第5卷. 北京: 群言出版社, 1999: 476.
[7] 梁启超.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C] / 梁启超文集. 北京: 燕山出版社, 1997: 215.
[8] 塞德曼 史. 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189.
[9] 刘建军. 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一项对政治知识基础的研究[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37.
[10] 欧克肖特.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6.
[11] 舍勒 马. 知识社会学问题[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200.

在制度运转中推进政治知识化

曹 沛 霖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 政治知识化是维系政治理性化发展的基本路径, 要避免政治知识化流于空议, 就必须使之制度化。因为规范的政治知识的源头并不是纯粹的理性思维, 也不源于无序的政治实践。制度化的政治过程是产生和创新政治知识的最可靠的来源, 也是政治知识不断理性化的保障。

政治发展离不开政治知识化, 政治知识化又离不开政治社会化, 而制度建设特别是政治制度

化的过程又是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方式。制度治理对于政治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于革命后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其中包含着两层意思: 一是要有制度, 二是还要让制度运转起来。制度与制度运转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也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同一政治过程。没有制度就谈不上

收稿日期: 2007-09-26
作者简介: 曹沛霖 (1933-), 江苏泰兴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国际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制度研究。

制度运转,但没有制度的运转,也就等于没有制度。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制度运转都是产生和创新政治知识的重要路径。但归根到底,政治知识化的每一步进展都要通过制度过程才能真正完成。正是由于这样的逻辑关系,我们应该让制度运转起来。

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制度的重要性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从20世纪后期以来,制度的重要性普遍受到关注。西方学界跳出行为主义,从理性上强调制度不全是“游戏的规则”,它关系一个社会建立什么价值的问题,并认为经过“政治制度的忘却与重新发现”后,“制度研究已经处于当代政治科学理论的中心地位”^[1]。在我国,促使人们高度关注制度问题的原因,毋庸讳言,是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切肤之痛。正是经历了这场浩劫,人们才从“人治”的传统中醒悟过来。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就深刻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³³³因此,我们总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联系起来同步进行。

制度建设和制度运转是相辅相成的同一政治过程。只有让制度运转起来,才能发挥制度的作用,才能使制度完善、优化和创新。历史的教训说明,我国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新宪法所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制度,尽管在今天看来还不够完善,但是,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部中国人民经过百年斗争而得来的好制度。可是,我们并没有让它真正地运转起来,以致几乎成为被遗忘的角落。直到今天,有这段记忆的人们的心中还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如果让这部宪法规定的民主制度真的运转起来,我们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也许就不会这个样子了,尽管历史是没有“如果”和“也许”的。另外,我们党早在革命年代建立的民主集中制也是一个好制度,可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它的运转却慢慢地停下来了。不仅没有进一步完善和严格的制度化,而且由于不运转而逐步发生异化,在“民主集中制”的名义下搞“一言堂”。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的讲话中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的教训。时至今日,这个总结仍有警示作用,我们一定要完善和创新,使它严格地制度化。否则,如邓小平所说,“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2]³³³这是我们用没有很好地将这样的制度运转起来的教训换来的政治知识——政治需要制度化。

政治制度建设是渐进的过程,任何制度都是在运转过程中逐步完善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制

度是“生长”的。在当今现实政治中,我们通过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让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建国之初就立下的制度真的运转起来了。我们的民主政治发展大为改观,被讽喻为“橡皮图章”的形象正在逐步隐退。民主选举制度,特别是基层直选制度、质询制度、听证制度、巡访制度以及各种监督制度等等,它们在制度创新的道路上一个一个地悄然生长出来。每一个制度的生长都是民族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进步的结晶。

毋庸置疑,这些新生长出来的制度是不够完善、甚至是很不完善的。但是,只要让他继续运转,总结经验,改革创新,就会完善起来。从这些年基层民主选举来看,由于让制度运转起来,各地方的选举就有许多创造。这些创造既是民主政治制度治理的实践,也是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对选民更是民主政治的训练和教育。只要我们在总的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的原则,让人民在民主政治运转过程中学会过民主政治生活,制度会自我完善,人民也会自我扬弃不合原则、不科学的东西。

在一定意义上,制度只有运转起来才会逐步完善,而决不会在人的头脑里完善起来。近年来,立法和行政部门常用听证制度来解决立法和决策难题,这就是让听证制度运转起来,是一大进步。但是,就严格的制度要求来说,在法律、规则、程序等方面是不完善的。特别是有的部门在运用这一制度时却从根本上违反了民主立法和民主决策的理念,从主观需要出发进行设计。规定陈述人和陈述内容,假借听证形式,制造民意,欺人欺己,以致借此作秀,为政绩造势。尽管如此,听证制度仍是个好制度,只要真的运转起来,它会通过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科学化逐步完善起来。2007年,某市人大常委会为召开某一事项的立法听证会,在媒体公开发布预备立法的名称、主题和基本内容,并告知市民凡愿到会作陈述者,可拨打电话或登录网上报名。这虽是一条不起眼儿的、不太会引人注意的信息,但它却告诉人们这个制度在运转过程中,在朝着民主化、公开化方面做改进。同时,在制度运转中人们也会逐步认识它,发挥和开发它的功能。听证制度不仅可以让当局了解民意和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而且可以集中民间的智慧、知识和经验,为立法和决策提供科学基础。并且,这也是一种公民有序的民主政治参与,是对公民的民主政治训练和教育,可以培养公民对公共事务的负责精神。让制度运转起来,不仅可以改进和完善制度本身,更重要的是可以为民众提供接触政治、认识政治、发现政治魅力的机会。

同时,随着制度运转起来,制度间会产生结构

性作用,相互支持、互为补充,政治制度建设的规律也会显露出来。《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中就有这样一条,对重大、复杂、疑难的信访事项的答复可以举行公开听证,通过答询、辩论、评议、合议等方式,查明事实,解决问题。显然,这就发挥了制度的结构性作用,把制度配套起来,加倍地发挥制度效应。以此类推,信访制度也可以与巡访制度结合起来,可以进行针对性的巡访。信访事项中如有重大的贪污腐败、以权谋私问题,可以通过巡访制度进行调查问责。如果事实确凿,就应进入制度运转程序;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应该还当事人以清白。这样,巡访制度也可以发挥积极保护正当权益的功能。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制度功能要在运转中才能逐步显示出来,这要靠人去认识它、挖掘它,这也是人与制度的一种关系。西方有位学者曾经说过,“制度是活的东西,是不轻易将它的秘密透露给刻板的文字的。”^[3]只有让制度运转起来,人们才能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地触及政治运动的规律,在促进政治知识增长的过程中使政治发展的道路变得豁然开朗。

钱穆先生在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探讨了“制度生长”、“现实环境”与“理论”的关系,他认为:“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必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决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唯此种现实中所产生之此项制度,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4]这一见解,颇有启发。制度背后还有制度精神,还有政治知识的累积,因此,让制度运转起来需要有政治知识化为支撑。同时,让制度运转起来又是推进政治知识化的现实路径。

参考文献:

[1] 古丁 罗,克林格曼 汉. 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03.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拉斯基 哈. 美国总统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1.
[4]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8. [责任编辑:冯昱锦]

政治知识化的核心议题:建构政治与知识的和谐关系

郭 剑 鸣

(浙江财经学院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理性化的政治发展是建立在政治知识化基础之上的。要顺利地推进政治化,首先要消除政治与知识通约的障碍,也就是建构政治与知识之间的和谐关系及其机制。建立和谐、科学的政治与知识的关系,重点是将知识领域的创新资源和政治领域的价值追求完美地结合起来。

政治发展需要以政治知识化为基础,因为政治本体就是知识,正如欧克肖特指出,“政治要求知识”,“每当我们从事政治活动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求那种知识”^[1]³⁸。但要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实现政治的知识化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政治知识化是政治哲学化、政治科学化和政治社会化的有机统一,这需要我们对政治进行全面的哲学检视,形成科学的政治与知识关系的观念,并通过科学的机制建构和谐的政治与知识的关系。

一、对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命题式思考

“知识即美德”、“哲学王”等称谓无疑是对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命题式思考的范例。将政治与知识关系提到命题的高度来认识,可以使政治与知识关系的问题更加严肃,有利于在这个问题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沉淀出一系列经得起历史推敲的结论,从而使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政治知识化的认识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正是造就科学政治生活的思想基石。

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命题的内涵是思考政治生活的知识基础问题。首先,它要回答政治道理依靠什么来说明和解释?政治现象主要依靠经验来解释?还是依靠知识来解释?进一步,是依靠神秘知识、神学知识,还是科学知识来解释?这个问

收稿日期:2007-09-26
基金项目: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06JDXM81001)资助
作者简介:郭剑鸣(1967-),男,江西吉水人,教授,法学博士,从事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